

# 1950—2013年顾炎武著述生平学术研究综述

周可真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3)

【摘要】文章主要综述了1950—2013年间中国大陆学界对顾氏遗著的文献学研究、顾氏生平的历史学研究和顾氏学术的整体研究之进展情况,对海外的顾炎武研究仅作了挂一漏万的简述。

【关键词】顾炎武;著述;生平;学术;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B2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73(2014)06-0051-18

顾炎武(1613—1682)是与黄宗羲、王夫之齐名的明清之际“三大儒”之一,本文为纪念亭林先生诞生400周年而作。<sup>①</sup>

自顾炎武逝世以来,无论是在清朝、民国,还是在新中国,他都广受学者推崇,也深得历代政府敬重,也因此对其生平、学术、思想的研究代代不绝,且越来越受重视,其研究广度与深度都获得了日益显著的发展。笔者研究顾炎武已二十年有余,其成果主要反映在拙著《顾炎武年谱》(1998)、《顾炎武哲学思想研究》(1999)和《明清之际新仁学——顾炎武思想研究》(2006)中。在写作《顾炎武年谱》期间,笔者曾对学术界的顾炎武研究情况做过一次学术调查,但受当时研究条件的限制,其学术调查范围相当有限。最近十多年来,顾炎武研究又获得了新进展,互联网也有突飞猛进的发展,故有必要也有了更好的研究条件来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的学术调查。但因为相关研究成果面广量大,在单篇文章中只能就局部领域的研究成果做一概括性综述,故本文仅限于综述顾氏遗著的文献学研究、顾氏生平的史学研究和顾氏学术的整体研究的学术进展情况,其时间跨度为1950—2013年,空间范围主要为中国大陆学术界,海外研究情况暂时只能作挂一漏万的简述。

## 一、研究论著概览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到2013年,公开发表和出版的海内外有关顾炎武的各种论著(包括

学术论文和专著以及其它著作和文章)总数为585,其中1950年代23,1960年代55,1970年代8,1980年代126,1990年代93,2000年代177,2010—2013年103。这些论著中,学术专著有20余部,硕、博士学位论文23篇(几乎全是2000年以后的作品),其中博士论文2篇——《顾炎武的哲学思想》(周可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99)和《顾炎武诗歌考论》(孙雪霄,山东大学,2011)。

1950年代23种论著中,学术专著有5部——《顾亭林学记》(张舜徽,1957年初版)、《明末三大思想家》(杨廷福,1955,台北)以及上面已提到的《顾亭林学谱》(谢国桢,1957)、《顾炎武传略》(赵俪生,1957)、《顾亭林学案》(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编,1954),其余均为单篇文章——主要有《爱国主义思想家顾炎武底反清斗争》(赵俪生,1951)、《顾亭人(亭林)学术之渊源——考据学之兴起及其方法之由来》(牟润孙,1954)、《明清之际何以会产生像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那样卓越的思想家?》(姚瀛艇,1954)、《行己有耻的顾亭林》(王恢,1955)、《顾炎武之学术思想》(林尹,1956)、《关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思想及其与〈红楼梦〉的关系》(曹道衡,1957)、《清代的古音学创始人顾炎武》(王显,1957)、《论顾炎武的〈蒋山佣残稿〉》(华忱之,1959)、《顾亭林的文学理论》(黄肖玉,1958)等。

1960年代55种论著中,除《顾炎武》(汪江,1960)、《顾亭林学记(增订本)》(张舜徽,1963)和《顾炎武的生活》(Willard J. Peterson, 1968, 美国)3

【收稿日期】2014-08-20

【作者简介】周可真(1958—),江苏宜兴人,教授,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

种著作外,单篇学术论文主要有《关于明初江南的官田》(森正夫,1960、1961,日本)、《顾亭林思想概略》(张勇,1960)、《〈日知录〉杨令公祠正误》(余国栋,1960)、《顾亭林的生平与学术思想》(黄逸民,1960)、《顾亭林教育思想之研究》(秦汝炎,1961)、《论顾亭林学术与儒家之真精神》(牟润孙,1961)、《顾炎武论学习》(邱椿,1962)、《顾炎武的史学》(邹贤俊,1962)、《爱国学者顾炎武》(吴晗,1962)、《顾炎武在山东的学术活动及其与李焕章辩论山东古地理问题的一校学术公案》(张维华,1962)、《顾亭林的文学思想》(钱仲联,1963)、《明末清初的学风》(谢国桢,1963)、《论顾炎武思想》(华山、王赓唐,1963)、《顾炎武的诗歌与散文》(王气中,1963)、《近代语文学史上的顾炎武》(黄淬伯,1963)、《论顾炎武的〈日知录〉》(刘毓璜,1963)、《顾炎武的思想风格》(张岂之,1963)、《顾炎武的社会政治思想和爱国思想》(吴泽、袁英光,1963)、《顾炎武反道学的斗争》(蒋祖安,1963)、《从顾炎武到章炳麟》(周予同、汤志钧,1963)、《顾炎武与十七世纪中国社会》(傅衣凌,1963)、《顾炎武〈日知录〉研究——为纪念顾炎武诞生 350 周年而作》(赵俪生,1964)、《危微精一与四海穷困——评顾炎武〈与友人论学书〉》(罗联络,1964)、《论顾炎武的爱国思想——与华山、王赓唐两先生商榷》(沈嘉荣,1964)、《坚持反清斗争的爱国学者顾炎武》(冉昭德,1964)、《对顾炎武爱国思想的重新评价》(洪焕椿,1964)、《略论顾炎武的诗》(陈友琴,1964)、《顾亭林之教育思想》(秦汝炎,1964)、《顾炎武的教育思想》(郑世兴,1964)、《关于顾炎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蒲鲁实》(蒲鲁实,1965)、《〈日知录〉札记》(何佑森,1966)、《亭林诗文用南明唐王隆武年纪号考》(潘重规,1966)、《顾亭林之生平及其思想》(胡秋原,1967)、《顾亭林的经学》(何佑森,1967)、《顾亭林的社会风气变迁论》(张承汉,1968)等。

1970 年代 8 种论著中,学术专著有 1 部——《顾炎武与清初经世学风》(黄秀政,1978,台北),故事类著作 1 本——《顾炎武的故事》(李永祥,1979),论文 4 篇——《评明清之际三大进步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肖任武,1975)、《顾炎武北上抗清考辨》(王春喻,1975)、《顾炎武与惊隐诗社》(谢国桢,1978)、《试论顾炎武的“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姚学敏,1979),另有《顾炎武的科学思想方法》(汪奠基,载汪著《中国逻辑思想史》,1979)和《顾炎武的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载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全四册)》,1979)。

1980 年代 125 种论著中,学术专著有 4 部——《顾亭林诗集汇注》(王遽常,1983)、《顾炎武诗译释》(卢兴基,1984)、《顾亭林与王山史》(赵俪生,1986)、《顾炎武与清初经世学风》(黄秀政,1987),另有《顾炎武》(沈嘉荣,1982;陈祖武,1984)等传记类著作 6 本,还有论文汇编 1 部——《顾炎武学术思想研究汇编——清代学术思想论丛之三》(存萃学社編集,1980,香港)和载于各类专著论集的文章 14 篇——《顾炎武的宇宙观、人性论、知行论》(孙叔平,载孙著《中国哲学史稿(下册)》,1981)、《顾炎武文化思想初探》(冯天喻,载冯著《明清文化史散论》,1984)、《亭林学案》(陈祖武,载杨向奎主编《清儒学案新编》,1985)、《黄宗羲、顾炎武的哲学观点》(张岱年,载张著《求真集》,1985)、《顾炎武以科学方法治经学》(冯契,载冯著《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下册)》,1985)、《清初务实学风的倡导者顾炎武》(陈祖武,载《明清实学思潮史》中卷,1989)、《顾炎武评传》(陈祖武,载《中国史学家评传(中)》,1985)、《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研究》、《爱国主义思想家顾炎武的反清斗争》、《清初遗民奔走活动事迹考略》(赵俪生,以上三篇俱载赵著《寄陇居论文集》,1981)、《〈日知录〉引唐割属东川六州制考》、《〈日知录〉部刺史条唐采访使原委》、《〈日知录〉享年格条注引辛琒考》(陈垣,以上三篇俱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 2 集)》,1982)、《跋顾亭林〈致归元恭札〉墨迹》(柴德赓,载柴著《史学丛考》,1982),单篇学术论文主要有《读书、调查、创新——顾炎武的治学方法》(任清,1980)、《读〈顾亭林文集〉札记》(华忱之,1980)、《顾炎武整理研究地方志的成就》(朱士嘉,1981)、《顾炎武及其教育思想新探》(秦佩珩,1981)、《顾炎武的哲学思想》(罗光,1981,台北)、《顾炎武〈日知录〉中的“四权”史观》(张孟伦,1982)、《顾炎武在古文献学上的成就》(孙钦善,1982)、《顾亭林年谱考录》(来新夏,1982)、《顾炎武与清代学风》(陈祖武,1982)、《顾炎武论世风》(高振铎、张玉彬,1983)、《屈大均与顾炎武》(棠生,1983)、《论顾炎武在〈郡县〉等七篇政治论文

① 顾炎武小名藩汉,谱名绛,学名继继,后仍名绛,字忠清,又字宁人,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又字石户,曾变姓名为蒋山佣,又曾称名曰圭年,学者称亭林先生,亦称涂中先生,南直隶苏州府昆山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公元 1613 年 7 月 15 日),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初九日(公元 1682 年 2 月 15 日)。

中提出的社会问题》(李洵,1983)、《顾炎武哲学思想剖析》(陈祖武,1983)、《论顾炎武的历史观》(沈嘉荣,1983)、《顾炎武思想的历史地位》(陈祖武,1983)、《明清之际三子之异同》(孔繁,1983)、《顾炎武与〈日知录〉》(孙钦善,1984)、《顾炎武的实学精神》(黄正藩,1984)、《清初三思想家爱国主义辨识》(魏鉴勋、袁闾琨,1984)、《论顾炎武的诗歌创作》(卢兴基,1984)、《论顾炎武的文学思想》(徐中玉,1984)、《论顾炎武两大代表作中的内部结构》(赵俪生,1984)、《黄宗羲、顾炎武合论》(陈祖武,1984)、《顾炎武的家世与早年生活》(赵俪生,1984)、《顾炎武与张尔歧》(赵俪生,1985)、《顾炎武的诗论与诗》(赵俪生,1985)、《顾炎武与清初学风的转变》(姜广辉,1985)、《顾炎武政治思想研究之回顾》(古伟瀛,1985,台北)、《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历史知识的态度——以顾炎武为中心》(古伟瀛,1985,台北)、《潘耒的史学——兼论顾炎武史学的继承》(曹光明,1985,香港)、《顾炎武北上抗清辨析》(黄正藩,1986)、《顾炎武与黄宗羲的交往》(沈潜,1986)、《清初朴学启蒙大师(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杨培桂,1986,台湾铭传大学)、《顾亭林〈日知录〉评介》(陈炽,1986,台湾铭传大学)、《论顾炎武文学思想的特色》(白坚,1986)、《顾炎武的“四声一贯”说》(朱晓农,1987)、《顾炎武与清代校勘学》(裴成发,1987)、《顾亭林之史论》(傅荣珂,1987,台北)、《顾炎武与清初两降臣——程先贞、史可程交游考论》(谢正光,1997,台北)、《顾亭林与钱牧斋》(赵俪生,1987)、《顾炎武的学术道路》(沈嘉荣,1988)、《略论顾炎武的修辞观》(顾义生,1988)、《顾炎武的私利观》(程一凡,1988)、《顾炎武〈古音表〉中“并入”和“收入”解析》(孙玉文,1988)、《顾炎武——经世致用的史学理论和社会实践》(赵俪生,1988)、《顾炎武江永的古声调理论》(龙异腾,1989)、《顾炎武与清代考据学》(郝润华,1989)、《明末清初的社会动乱与顾炎武的文学思想》(卢兴基,1989)、《论顾炎武的学术思想》(卢兴基,1989)、《顾炎武诗歌理论初探》(张兵,1989)、《顾炎武论‘世风’——读〈日知录〉卷十三》(洪波、姬虹,1989)、《顾炎武诗歌理论初探》(周立群,1989)等。

1990年代92种论著中,学术专著有4部——《顾炎武论考》(沈嘉荣,1994)、《顾炎武年谱》(周可真,1998)、《顾亭林诗笺释》(王冀民,1998)、《顾炎武哲学思想研究》(周可真,1999),学术论文主要有《顾炎武及其诗》(白敦仁,1990)、《试论顾炎武诗歌

的艺术成就》(张兵,1990)、《顾炎武诗歌思想价值简论》(张兵,1990)、《顾炎武的史学成就》(施丁,1991)、《从〈日知录〉一书看顾炎武的政治思想》(郝润华,1991)、《从顾炎武对入声的认识看其古音研究的得失》(杨荣祥,1992)、《顾亭林“济南狱”与〈赴东诗〉考论》(王冀民,1992)、《顾炎武北游事迹发微》(赵刚,1992)、《顾炎武与复社》(周可真,1992)、《顾炎武经济思想简论》(田泽滨,1992)、《顾炎武关中行迹考述》(卢兴轩,1992)、《试论顾炎武在人文地理学方面的贡献——〈天下郡国利病书〉精要之所在》(赵俪生,1992)、《顾炎武的文化观》(钟国荣,1992,台北)、《顾炎武文学思想得失探》(邬国平,1993)、《顾炎武与昆山徐氏兄弟》(戈春源,1994)、《顾炎武商品经济思想浅探》(周可真,1994)、《顾炎武山东入狱考》(鲁海,1994)、《顾炎武唯物论思想的特色》(王步贵,1994)、《顾炎武的历史变革思想》(周文玖,1994)、《顾炎武的伦理哲学思想》(吴远,1994)、《徐夜与顾炎武》(张光兴,1994)、《顾炎武文学观新探》(张绪新,1995)、《顾炎武的经学批评》(周文玖,1995)、《从〈日知录〉看顾炎武论世风》(陈秀娟,1995)、《论顾炎武教育思想及其对吴地的影响》(徐启彤,1995)、《试论顾炎武对吴才古音学的吸收与扬弃》(马重奇,1995)、《告别理学:顾炎武对朱学的批判》(赵刚,1995,台北)、《顾炎武对历史文献学的贡献》(王云,1996)、《顾炎武的历史盛衰思想》(周文玖,1996)、《顾炎武山水诗简论》(王英志,1996)、《顾炎武和杜甫》(屈守元,1996)、《论顾炎武的咏史咏物诗》(张兵,1996)、《李光地与〈音学五书〉》(张民权,1996)、《顾炎武的史评及治学》(周文玖,1997)、《顾炎武诗歌的创作理论与实践》(吴景山,1997)、《顾炎武与清代考据学》(王俊义,1997)、《顾炎武著书考略》(曹之,1997)、《略谈顾炎武在历史文献学方面的贡献》(崔文印,1997)、《顾炎武与自由贸易论》(金扬,1997)、《顾炎武古音学成就论衡》(张民权,1998)、《顾炎武与徐乾学兄弟》(暴鸿昌,1998)、《顾炎武对入声的认识及其影响》(陈燕,1998)、《顾炎武德育思想的实学特色》(肖永明,1998)、《顾炎武与清初两降臣——程先贞、史可程交游考》(谢正光,1998,台北)、《顾炎武论明代官场病》(高寿仙,1999)、《论顾炎武〈诗本音〉通韵合韵关系处理之得失》(张民权,1999)、《顾炎武在关中》(赵俪生,1999)、《顾炎武对古韵分部及其演变的研究上——阴声韵的离合及相关问题》(张民权,1999)、《顾炎武对〈诗经〉韵例的研究》(张民权,1999)、《论顾炎武的历

史哲学》(魏长宝,1999)、《论顾炎武的“众治”思想》(周可真,1999)、《论顾炎武哲学的个性特点》(周可真,1999)、《顾炎武的公私观》(周可真,1999)、《论顾炎武的天人观》(周可真,1999)、《顾炎武、王夫之政治思想之异同》(张春莉,1999)、《〈日知录〉纂修考》(曹江红,1999)、《论顾炎武的思维方法——兼论宋明理学到清代朴学的历史转变》(周可真,1999)、《论顾炎武的遗民心态》(郭德英,1999)、《清初的遗民与贰臣——顾炎武、孙承泽、朱彝尊交游考》(谢正光,1999,台北)等。

2000年代177种论著中,学术专著有3部——《旷世大儒——顾炎武》(陈祖武,2000)、《一代儒宗顾亭林》(葛荣晋、魏长宝,2000)、《明清之际新仁学——顾炎武思想研究》(周可真,2006),论文集1本——《顾炎武与中国文化》(周可真,2009),硕士学位论文11篇——《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社会治乱思想初探》(刘冰,中央民族大学,2005)、《从〈日知录〉看顾炎武历史编纂思想》(任利伟,东北师范大学,2006)、《顾炎武旅游考论》(武少青,上海师范大学,2007)、《困境与超拔——顾亭林诗歌的文化心灵解读》(付定裕,华东师范大学,2007)、《顾炎武经世致用思想初探》(宋天宇,东北师范大学,2008)、《顾炎武政治旅游研究》(牛余宁,曲阜师范大学,2009)、《顾炎武治理思想初探》(杨帆,苏州大学,2009)、《顾炎武〈金石文字记〉研究》(许丹,华东师范大学,2009)、《论顾炎武的金石学成就与贡献》(辛世芬,山东大学,2009)、《顾炎武的教育心理思想研究》(余芳,上海师范大学,2009)、《〈唐韵正〉个别字韵部演变研究考论》(洪小斌,西北师范大学,2009),其他学术论文主要有《从顾炎武说到王国维上——兼论中国文化的特质》(蔡仲德,2000)、《论顾炎武的经学思想》(魏长宝,2000)、《顾炎武论史书编纂》(周文玖,2000)、《〈顾亭林先生年谱〉释误》(曹江红,2000)、《顾炎武“明道救世”的礼学思想》(林存阳,2000)、《顾炎武与乾嘉学派》(魏长宝,2000)、《论顾炎武的理学思想》(魏长宝,2000)、《顾炎武〈历代帝王宅京记〉析论》(李廷勇,2000)、《顾炎武文学观管窥》(陈公望,2000)、《论顾炎武的“教化”思想》(周可真,2000)、《评〈肇域志〉》(朱惠荣,2001)、《正确理解顾炎武八股文取士“败坏人才”说》(祝总斌,2001)、《顾炎武哲学研究活动之考察——兼论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周可真,2001)、《顾炎武散文的思想与艺术》(张兵,2001)、《略论顾炎武哲学的历史地位》(周可真,2001)、《顾炎武与“文选学”——以〈

日知录〉为例》(徐正英,2001)、《顾炎武与曹溶论交始末——明遗民与清初大吏交游初探》(谢正光,2001)、《顾亭林交游年表》(谢正光,2001)、《顾炎武:开启清代朴学思潮第一人》(张敏、李海生,2002)、《顾炎武与杜甫诗注》(邬国平,2002)、《顾炎武古音学思想之继承与阐释——高树然〈诗音〉研究一》(陈芳,2002)、《试论顾炎武的私营经济思想》(周可真,2002)、《“经学即理学”刍议》(王世光,2002)、《顾炎武的政治思想》(大西克己,2002,日本)、《顾炎武的诗学史意义》(蒋寅,2003)、《博学有耻,求实创新——论顾炎武的学术道德思想》(郭清香,2003)、《顾炎武与中国学术传统》(周可真,2003)、《黄宗羲顾炎武之比较》(周文玖,2003)、《顾氏家学及其对顾炎武学术的影响》(鱼宏亮,2003)、《论顾炎武的军事思想》(周可真,2003)、《顾炎武的金石与史籍互证》(吴军兰,2003)、《高澍然与顾炎武古韵分部之比较——高澍然〈诗音〉研究二》(陈芳,2003)、《顾炎武史学思想新探》(许苏民,2003)、《顾炎武与浙西史学》(许苏民,2004)、《顾炎武〈菰中随笔〉版本》(李雪梅,2004)、《简评顾炎武关于上古声调的认识》(陈雪竹,2004)、《顾炎武散文初探》(张兵,2004)、《论顾炎武经济思想中的近代性因素》(许苏民,2004)、《顾炎武哲学的问题意识与思想理路》(许苏民,2004)、《符山堂刻本〈音学五书〉版本问题考释》(张民权,2004)、《顾炎武早期韵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张民权,2004)、《论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德治思想》(李晓梅,2005)、《重礼与顾炎武的历史治乱思想》(吴海兰,2005)、《拨乱反正、回归元典:顾炎武的学术思想改造纲领》(陶清,2005)、《顾炎武常以数字入诗》(吴柏森,2005)、《明清之际政治哲学的突破——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例》(许苏民,2005)、《王猷定与顾炎武文字交往之评判》(方良,2006)、《朴学眼光中的文学——〈日知录〉文学观浅说》(潘定武,2006)、《顾炎武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命运》(许苏民,2006)、《顾炎武与中国传统学术的转型》(陈国庆,2006)、《明清之际关学与外界的学术互动——以李二曲与顾炎武的交往为例》(常新,2006)、《顾炎武的杜诗学》(田小军、孙微,2006)、《“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与中国伦理学的近代转型——论顾炎武道德伦理思想中的近代性因素》(许苏民,2006)、《康熙二年顾炎武在山西与曹溶、李因笃的交游考——兼论顾亭林的交游思想》(王星慧,2006)、《试析顾炎武在古韵分部过程中对系联法的运用》(谢艳红,2006)、《论顾炎武政治思想

的三大理论特色》(许苏民,2006)、《顾炎武官田论中的土地所有思想及其背景》(森正夫,2006,日本)、《顾炎武“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思想浅析》(叶建,2007)、《同代异梦——简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的国家理论》(张永忠,2007)、《顾炎武〈日知录〉的词汇、词义研究及其现实意义》(孙良明,2007)、《论顾炎武的风俗观》(鲁芳、张秋良,2007)、《顾炎武〈易〉音研究条例初探——顾氏〈易音〉“承其义则亦承其音”辨》(吴国源,2007)、《释“萧然物外,自得天机”——顾炎武何以认为自己不如傅青主》(许苏民,2007)、《试论顾炎武的“经学即理学”思想》(吴长庚,2007)、《顾炎武学术思想倾向之定位》(龙飞,2007)、《顾炎武的易学研究成就》(任利伟,2008)、《顾炎武北游不归的地域倾向性探析》(陈友乔、黄启文,2008)、《顾炎武经济思想述评》(文峰,2008)、《从出土材料看顾炎武的易学成就》(刘源、曲静,2008)、《申涵光、顾炎武交游考略》(刘秋彬,2008)、《试论潘耒对顾炎武学术的师承》(赖玉芹,2009)、《再论顾炎武的离析唐韵》(谢艳红,2009)、《论顾炎武的经学道统观》(潘志锋,2009)、《顾炎武北游不归之原因探析》(陈友乔,2009)、《论顾炎武的〈春秋〉经传研究》(金永健,2009)、《论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的学术史意义》(陈敏荣,2009)、《解决末世危机的不同取向——傅山与顾炎武文化思想的差异》(房春草,2009)、《顾炎武与朱鹤龄交往考论》(周金标,2009)、《顾炎武对明代空疏学风痼疾的深层认识》(赵旸,2009)、《吴棫、陈第、江永、段玉裁与顾炎武古音研究比较》(谢艳红,2009)、《〈日知录之馀〉版本考略》(侯体健,2009)、《顾炎武对谐声的利用及其意义》(谢艳红,2009)、《顾炎武论伦理关系与社会治理》(赵旸,2009)等。

2010—2013年间103种论著中,学术专著有1部——《顾炎武评传》(陈祖武,2010),博士学位论文有孙雪霄的《顾炎武诗歌考论》,硕士学位论文有10篇——《明末清初史学思想的衍变》(王博,陕西师范大学,2010)、《顾炎武〈音论〉研究》(高天霞,西北师范大学,2010)、《顾炎武〈音学五书〉入声韵研究》(胡蓉,华中科技大学,2010)、《论顾炎武诗学思想的价值取向》(宁兵,山东师范大学,2010)、《顾炎武〈日知录〉中的实学思想》(潘世华,四川师范大学,2010)、《顾炎武山东经历考述》(王延栋,东北师范大学,2011)、《顾炎武赠答诗研究》(解玉,辽宁大学,2012)、《顾炎武咏史诗研究》(李婵,陕西师范大学,2012)、《顾炎武〈历代宅京记〉研究》

(裴蕾,西北民族大学,2012)、《〈日知录〉“采铜”研究》(汪首豆,安徽大学,2013),其他学术论文主要有《论顾炎武的史学思想》(赵旸,2010)、《顾炎武与清代学术之转向》(董平,2010)、《论顾炎武的“古诗无叶音”》(苗青竹、王利昆,2010)、《顾炎武〈仪礼〉学探析》(陈晓东、田汉云,2010年)、《顾炎武经世致用思想成因探究》(王立、宋天宇,2010)、《二十世纪顾炎武诗文研究评述》(孙雪霄,2010)、《顾炎武与清初〈春秋〉经学》(罗军凤,2011)、《杨慎、顾炎武考据学对贬宋论的推衍》(张祝平,2011)、《顾炎武在即墨的交游与创作》(韩梅,2011)、《由“世风”看顾炎武的吏治思想》(于凤辉,2011)、《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从祀孔庙始末新考》(段志强,2011)、《作为一部古代风俗简史——顾炎武〈日知录〉“周末风俗”五条》(张京华,2011)、《“归奇顾怪”——归庄与顾炎武交游考》(周于飞,2011)、《田氏九歌堂藏顾亭林致王山史札考》(秦蓁,2011)、《黄宗羲与顾炎武分权治理思想辨析》(闫晨,2011)、《试论王学对顾炎武的影响》(耿加进,2011)、《顾炎武〈金石文字记〉治学方法论》(许丹,2011)、《在义理与经世之间——论顾炎武学术思想体系的构建》(王寅,2011)、《顾炎武访碑考——以〈金石文字记〉著录碑刻为研究对象》(许丹,2012)、《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小学成就考论》(许丹,2012)、《顾炎武“方音押韵”与段玉裁“合韵”论析》(刘忠华,2012)、《陈垣〈日知录校注〉读评》(张京华,2011)、《黄宗羲〈建都篇〉与顾炎武〈历代宅京记〉》(薛婧,2012)、《顾炎武撰〈建康古今记〉述略》(胡箫白,2012)、《论顾炎武对颜之推思想的继承》(程时用,2012)、《诸家转注论考:兼评顾炎武转注观》(高天霞,2012)、《〈天下郡国利病书〉流传考》(黄坤,2012)、《简论〈音学五书〉》(张艳超,2012)、《清初〈易〉学的变辙——从顾炎武到潘耒》(吴超,2012)、《顾炎武诗歌对杜甫诗歌的继承与新变》(石明扬,2012)、《论顾炎武“改字就韵”与段玉裁“合韵”的分歧》(刘忠华,2012)、《张畊与顾炎武古韵分部比较研究》(王欢欢,2012)、《顾炎武古韵歌部支韵字演变研究考论》(渠佳敏、洪晓斌,2012)、《顾炎武与诗经研究》(赵建坤,2012)、《清前期批评性的春秋学——顾炎武的〈日知录〉〈春秋杜解补正〉》(文廷海,2012)、《顾炎武、江永、段玉裁对幽、侯部处理之比较》(陈秀然,2013)、《试论顾炎武〈音学五书〉中对庚韵字的离析》(赵林晓,2013)、《顾炎武平等思想研究》(欧阳斐,2013)、《顾炎武的风俗论与社会

诚信建设》(王君柏,2013)、《顾炎武的社会管理思想》(周可真,2013)、《顾炎武的社会理想及政治学说——读〈亭林文集〉〈郡县论〉及相关诸论书后》(瞿林东,2013)、《顾炎武〈音学五书〉中的谐声观》(曹志国,2013)、《顾炎武论经学与诗学》(郑丽君,2013)、《晚明西学东渐与顾炎武政治哲学之突破》(许苏民,2013)、《对顾炎武、方苞文论的一个考察》(邬国平,2013)、《论顾炎武的史学思想》(郑朝彬,2013)、《顾炎武对“道统论”的再诠释》(王寅,2013)等。

## 二、对顾氏遗著的文献学研究

顾炎武的著作是开展顾炎武研究所依凭的最基本原始资料。顾炎武一生,著作等身,然其生前刻印行世者仅有《日知录》(八卷,初刻于康熙九年)、《音学五书》(三十卷,符山堂刻本,由顾氏友人张弢刊于淮阴,自康熙六年开雕,约至康熙十八年刻成<sup>①</sup>)、《生员论》、《钱粮论》、《北游诗》、《下学指南》<sup>②</sup>以及《七经误字》(康熙十年刻于山西之交城)等七种。另外,《左传杜解补正》是由顾氏晚年结识的友人张云翼(字鹏扶,一字又南)捐资刊刻,但不知其刊刻时顾氏是否还在世。康熙二十一(1682)正月九日,顾炎武病逝于山西曲沃,其遗书文稿为其外甥徐乾学、徐元文取至北京,秘不示人。但徐氏兄弟对舅氏书稿“不知爱惜,或为人取去”<sup>[1]</sup>,遂致其遗著颇多散佚。幸好顾炎武晚年将其部分手稿交由他最信任的弟子潘耒(字次耕,又字稼堂)及友人李因笃(字子德,一字孔德,号天生)保存——康熙十七年夏秋之际其《与潘次耕札》有云:“至于著述诗文,天生与吾弟各留一本,不别与人以供其改窜也。”<sup>③</sup>康熙年间,潘耒刊刻了其先生交由他保存的遗著,其中《日知录》的全部手稿经删改后被编为32卷,康熙三十四年(1695)得到福建布政使汪楫(1626—1689,字次舟,号悔斋)的资助,刻印于闽之建阳,其余手稿被辑成《亭林遗书》(10种27卷)亦陆续刊出,与前者并为遂初堂刻本。

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遂初堂刻本《亭林遗书》被列入抽毁的书目,其中《亭林文集》(6卷)和

《亭林诗集》(5卷)二种被认为“均有偏谬词句,应行销毁”,而《昌平山水记》(2卷)“亦有乖谬之处,应行抽毁”,唯《左传杜解补正》(3卷)、《九经误字》(1卷)、《石经考》(1卷)、《金石文字记》(6卷)、《韵补正》(1卷)、《读觚十事》(1卷)、《顾氏谱系考》(1卷)等7种“均系辩正经史之书,有裨考证,查无干碍,应请毋庸销毁”<sup>[2]</sup>。至光绪年间,文网松弛,《亭林遗书》乃有多种刻本,其中十一年至三十二年(1885—1906)在朱记荣(字懋之,号槐庐)主持下陆续编刻印行的《亭林遗书汇辑》收书最多,除遂初堂刻本10种以外,更增加了《五经同异》、《圣安纪事》、《明季实录》、《历代帝王宅京记》、《营平二州地名记》、《山东考古录》、《求古录》、《菰中随笔》、《救文格论》、《亭林杂录》、《亭林诗集》、《亭林文集》、《亭林余集》、《亭林佚诗》等14种,另附有《亭林先生年谱》、《亭林先生神道表》、《亭林先生同志赠言》,还有《亭林像赞》、何绍基《顾先生祠诗》、《亭林遗书后序》、《校刊亭林先生遗书缘起》、《亭林先生著述总目》、《书顾氏遗书总目后》等,其校刻精良,堪称善本。2011年,凤凰出版社以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光绪戊子冬月校刊朱氏校经山房藏板本(一函二十册)为底本,分四册影印出版。

《日知录》遂初堂刻本面世后,乾隆六十年(1795)又有重刻遂初堂本,末附《日知录之余》二卷,另有乾隆年刊巾箱本、《四库全书》本、《皇清经解》本。道光初,嘉定诸生黄汝成(字庸玉,一字潜夫)以遂初堂刻本为底本,参以阎若璩、沈彤、钱大昕、杨宁四家校本,并收录道光前九十余家学者对《日知录》的研究成果,编成《日知录集释》。后来黄氏又得到《日知录》原写本,遂参以陈讷、张惟赤、遽园孙氏、楷庵杨氏四家校语,撰成《日知录刊误》二卷;后得陆筠校本,又撰成《日知录续刊误》二卷。黄汝成之后,李遇孙著《日知录续补正》,补阎若璩《日知录补正》之余,又有丁晏《日知录校正》、俞樾《日知录小笺》、黄侃《日知录校记》以及潘景郑《日知录补校》、《日知录版本考略》等。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清道光十四年嘉定黄氏西谿草庐重刊定本影印出版《日知录集释(外七种)》(全三册)。

① 康熙十八年六月,顾炎武犹言“今欲……为淮上之行,以竣《五书》之刻”(顾炎武:《蒋山佣残稿》卷三《答次耕书》;周可真:《顾炎武年谱》“康熙十八年67.28”条),可见其时尚未竣工;同年秋又谓“弟近二十年精力并用之音韵之学,今已刻之淮上,惟待自往与张君力臣面加订改”(《蒋山佣残稿》卷三《复汤荆岷书》;周可真:《顾炎武年谱》“康熙十八年67.41”条),则其时已然刻成,但顾炎武还想亲自校订一番,所以对他来说就还不能算是竣工,只是他未及亲校便离开人世了。

② 《生员论》等四篇至迟在康熙十七年(1678)已刻印出来(参见康伟、康端:《莘野先生年谱》“康熙戊午,三十六岁”条,载《关中丛书》第三集《康莘野遗书》),特不知其刻印之详情。

③ 《亭林余集》。按:此文写作时间,参见周可真:《顾炎武年谱》“康熙十七年66.11”条。

1990年8月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以黄汝成集释本为底本、由栾保群、吕力校点的《日知录集释(全两册)》,2006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又重加印行。

以上刊印的亭林遗著中都不包括《天下郡国利病书》,该书在清代没有刻本,至民国才由商务印书馆收入《四部丛刊》,其底本是由昆山图书馆提供的亭林手注原稿,此手稿最初藏于徐乾学的传是楼,后归吴县藏书家王闻远(清初思想家唐甄女婿)所有,后转入长洲藏书家黄丕烈之手,再几经转手归苏州古籍收藏家吴讷士(苏州草桥中学创始人)所有。宣统元年(1909),在王颂文与方还(均为讷士友人)的撮合下,吴讷士将其所藏之书赠于昆山图书馆。1933年,昆山县县长彭百川、图书馆馆长王颂文、教育局局长潘鸣凤会议决定将《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稿交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主编张元济将其列入《四部丛刊三编》。<sup>[3]</sup>1956年,其原稿为南京图书馆发现<sup>[4]</sup>,后被收藏于南京图书馆。2002年,昆山顾炎武研究会经过整理并加标点,后将《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稿付梓于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该书分为六册,横排、简体字,2003年4月正式出版,但所出之书全部归昆山政府所有,并不对外行销。

顾炎武的另一部历史地理学著作《肇域志》(又名《肇域记》),其康熙元年(1662)十月所作《书杨彝万寿祺等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一文中称其时已写成《肇域记》,但阮元《揅经室三集》卷四《顾亭林先生〈肇域志〉跋》谓“此《肇域志》稿本,未成之书”,这或许是因该书在顾氏逝世后流传多种钞本(有15部抄本流传,今存11部)之故,阮元所见只是其中已有部分佚失的一种钞本。据晚清曲家许善长(1823—1891,号玉泉樵子)所撰《碧声吟馆谈麈》卷四(光绪四年刻本)《记赵叔》云:“余家藏有顾亭林先生《肇域志》手稿二十册。先曾祖得之粤东藩司任内,先祖爱如珍宝,藏之内室,不与群书同列。一时阮文达、孙文定、李□斋、陈恭甫诸老辈题跋盈寸。”<sup>[5]</sup>阮元所见者必是许家所藏之手稿,其题跋称“观此帙密行细书,无一笔率略”。然许氏谓“庚申辛酉杭城两次失守(引者案:指太平军于1860年和1861年两度攻克杭州),手稿已遗失,同归于尽矣。”又据《胡培系杂著·请校刊顾亭林先生郡国利病书议》云:“《肇域志》原稿,曩在浙江许周生驾部宗彦家。咸丰乙卯培系曾为前署两浙盐运使缪武烈公梓校,钞一副本。庚申粤匪窜扰,武烈殉难,书亦被□。驾部文孙季仁、中翰、善长携家远宦,其原稿遂不可问。同治间曾文正公开府两江,得浙江蒋氏《肇域志》抄本,属江宁汪梅村孝廉士铎,商榷体例,

拟以活字板印行,文正公旋督师北上,其事遂寝。”曾国藩嘱汪梅村编次的蒋氏《肇域志》抄本有成容镜跋而未刊行,后来为徐森玉(上海博物馆首任馆长)所得,徐先生于1959年将其手稿献给国家收藏<sup>[6]</sup>,此即陈光贻《稀见地方志提要(上册)》(齐鲁书社1987版)所录之上海图书馆藏五十卷《肇域志》抄本。陈先生提要称:“今存此抄本外,见《台湾善本书目》著录抄本,存册与此本同,页数未详。另有北京图书馆藏抄本,清王雪舫所抄焉,存二册、六卷,有韩应陛跋。三种并合,仍不可臻全。”但陈先生未提及云南省图书馆藏之清同治元年(1862)钞本《肇域志》,此钞本被有关专家一致认定为“保存最为完好、最能反映稿本原貌”<sup>[7]</sup>者。2004年,以此钞本作底本的点校本《肇域志》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据蒋维崧介绍,1982年,谭其骧先生提出整理出版《肇域志》的建议,立即得到时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的李一氓先生的支持,将其列为全国重点项目,拨给启动资金,并电示上海、云南两地政府有关部门予以支持。参与整理工作的有复旦大学王文楚、葛剑雄等,云南大学朱惠荣等。双方在1982年至1985年于上海、昆明两地共召开工作会议四次,择定所用底本与参校本,商定点校凡例,定点校样稿,且分配了点校任务,其整理《肇域志》之底本则择定为云南省图书馆藏本,参校本有四川省图书馆藏本、上海图书馆藏本以及南京图书馆藏益山精舍南直隶部分十册、竹书堂浙江部分二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南畿部分十册,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应天府部分三册。全书共出校勘记一万三千五百余条,校勘引用史书、子书、类书、字书、文集及明清民国总志、方志多达数百种,全部校勘记是对《肇域志》作了一次笺证和全面清理。<sup>[7]</sup>

潘氏遂初堂《亭林遗书》初印本《亭林文集》卷六收有《读隋书》,此篇原系顾炎武从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三《国用考一》“历代国用”条抄出备览的读书笔记,潘未误作亭林著述收入《亭林文集》中,但不久他便发现了这一错误,遂将其掉换成《顾与治诗序》和《方月斯诗草序》二篇。然《四部丛刊》所收《亭林文集》仍将《读隋书》列入其中,中华书局1959年初版《顾亭林诗文集》亦收有此篇<sup>[8]</sup>,但1983年出第2版时已将此篇抽去,又新增进《蒋山佣残稿》(3卷99篇,其中一篇文字残缺)和《佚文辑补》(57篇),其中《残稿》中有60篇文章不见于先前各种版本的《亭林文集》,其余亦见于后者,但二者文字上互有出入,这也使二者可以互补、互校。中华书局1983年第2版《顾亭林诗文集》还在《诗集》部



分添加了4篇佚诗,故该版本的亭林诗文集是较为完备的本子。

2013年是顾炎武诞生400周年,在其前夕,2011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专家编纂整理的《顾炎武全集》(全22册),这是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组织有关专家,经过严密细致的考证,对讹传已久的托名之作进行了彻底澄清之后,最终从众多“顾氏著作”中找出的“确定无疑”的顾炎武存世全部著作总集,整理者精择底本,详加校勘,历时八年而成其书。全书收录顾炎武各类著作34种(经部9种、史部17种、子部5种、集部3种):第一册《左传杜解补正》、《五经同异》、《九经误字》,第二册《音学五书(一)》,第三册《音学五书(二)》、《韵补正》,第四册《熹庙谅阴记事》、《圣安纪事》、《明季实录》、《历代宅京记》、《昌平山水记》、《营平二州地名记》,第五册《建康古今记》、《京东考古录》、《谯觚十事》、《金石文字记》、《石经考》、《顾氏谱系考》、《求古录》、《官田始末考》,第六册《肇域志(一)》,第七册《肇域志(二)》,第八册《肇域志(三)》,第九册《肇域志(四)》,第十册《肇域志(五)》,第十一册《肇域志(六)》,第十二册《天下郡国利病书(一)》,第十三册《天下郡国利病书(二)》,第十四册《天下郡国利病书(三)》,第十五册《天下郡国利病书(四)》,第十六册《天下郡国利病书(五)》,第十七册《天下郡国利病书(六)》,第十八册《日知录(一)》,第十九册《日知录(二)》、《日知录之余》,第二十册《菰中随笔》、《亭林杂录》、《救文格论》、《惧谋录》,第二十一册《亭林诗文集》、《诗律蒙告》,第二十二册《附录》,其中90%的品种为首次规范整理出版。复旦大学教授、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认为,《顾炎武全集》的出版对顾氏的全面研究和全新认识颇具价值。

要之,1950年以来中国大陆学界在顾炎武遗著的收集、整理、辨证和编辑出版方面的成就,集中体现在中华书局1983年《顾亭林诗文集》点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肇域志》点校本和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03年《天下郡国利病书》点校本的先后出版,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顾炎武全集》点校本的出版则是总集大成之果。

### 三、对顾氏生平的史学研究

对顾炎武生平的历史学研究,按其成果形式可分为年谱、传记、评传、小传、考证五种。

#### (一)年谱

此类研究成果不多,仅有论文2篇——《顾亭林年谱考录》(来新夏,1982)和《〈顾亭林先生年谱〉释误》(曹江红,2000),专著1部——《顾炎武年谱》(周可真,1998)。

《顾炎武年谱》是本文作者所著。年谱是开创于宋代的一种人物传记体裁,所谓“叙一人之道德、学问、事业,纤悉无遗而系以年月者,谓之年谱”<sup>[9]</sup>。从实质上讲,年谱就是记述某个人一生之特殊经历的编年史。从思想史角度看,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无非即是其特殊人生经历的反映。故研究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便必须首先了解其特殊的人生经历——这是“从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的唯物史观的应有态度。笔者从年谱入手来开展顾炎武思想研究,缘由即在于此。清代有多种顾氏年谱,其中当推张穆和钱邦彦所编二种为上品,尤以前者为佳。然即张氏所编来看,其中讹误亦颇可观,问世后曾先后有常庸、王国维、叶廷琯、杜呈祥、王棻友、赵俪生等先生为之校补、订误。而据新的材料(如《蒋山傭残稿》),其谱舛误疏漏之处,实远非仅如前人所见。故新编顾氏年谱已属必要。且清人所编之年谱,乃纯系由“死”材料堆积而成,缺乏逻辑的和理论的分析,使材料间的内在联系隐而不彰。此种机械的编谱方法亦实有加以革新之必要。出于上述考虑,笔者在详尽地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参照《明鉴纲目》之体例,编成了这本《顾炎武年谱》。是谱出版后,现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的黄玉顺教授曾以“田之光”为笔名发表了《亭林研究有力作,年谱撰著出新篇——评周可真著〈顾炎武年谱〉》<sup>①</sup>,予以专门评介。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孙雪霄博士在有关学术评论中亦曾予评说,孙博士如此评介道:“周可真历时十年著成《顾炎武年谱》(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此书四十六万字,较之之前各家更为完备,更符合新时期顾炎武研究之需。作者仿照《明鉴纲目》体例,以‘纲目体’编撰年谱,以‘纲’来纪事,以‘目’来发挥,条理清晰,且目为四种:‘注释’目用以补充‘纲’的内容,‘考辨’目,对‘纲’所涉及史事加以考辨,‘论析’对纲进行理论分析,‘附录’目则广泛征引与纲之史事有关材料,以备读者翻检查考。此外,作者除了参阅前人所编年谱外,更注意搜求、采纳本世纪(引者按:指20世纪)发现的新材料和研究整理的新成果,如《顾亭林诗文集》、《清诗纪事》、

① 刊载于《苏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顾氏友人年谱、清人笔记等书皆被用来考辨顾炎武的思想行迹,故其考证较之前人更加精审。”<sup>[10]</sup>

## (二) 传记

以专著形式出版的顾氏传记作品只有数种,最早有赵俪生所著《顾炎武传略》(1957),后有汪江所撰《顾炎武》(1960),二十余年后又又有沈嘉荣之作《顾炎武》(1982),赵俪生复著《顾炎武新传》(1986),它们都是比较典型的史学范畴的传记,着力书写传主的历史。赵先生以1985年初春发表于上海《书林》杂志的一篇文章《我为什么总在写顾炎武的传》作为其“代序”来说明他所以又作《新传》的缘故:“很多学者写顾的传,大都偏重在‘学’上,对‘行’,特别是对他‘学’、‘行’的关系触及不多,我要来弥补这个缺陷。”<sup>[11]</sup>赵先生在《新传》中根据清康熙刻本程正夫《海右陈人集》、潘道根手抄本徐元文《含经堂集》、抄本《惧谋录》等许多与顾炎武研究关系密切的珍贵史料,对顾炎武一生行迹、交友及思想作了较其先前所著更加精切、深刻的论述。赵先生对于顾炎武的总体评价是:首先,他是一个爱国的人,微观上爱的是朱明王朝,爱的是崇祯皇帝,宏观上爱的是民族和国家;其次,他是一个做学问的人,终生不停止做学问的人;再次,他是一个活动家,既跋山涉水,稽古考古,从事学术上的调查研究活动,又从事若干秘密活动以图反清复明;再其次,他还是一个有胆识、谋略、心计更有节操、情趣、才华又有性格的人。赵先生原拟在《新传》基础上“写出一部比较像样的《顾炎武大传》,以为治此终生不辍的一种交代”<sup>[11]</sup>,无奈天不假年,他终究未能在其有生之年如愿完成《顾炎武大传》。汪著则未曾寓目,而沈著为其后之作《顾炎武论考》所吸纳和超越。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朱田艳在《经济研究导刊》2011年第5期发表了《浅析“双重身份”下的顾炎武传记——从学者、志士身份看顾氏传记》一文,探讨了顾炎武传记之所以会在晚清及民国初年大量涌现的原因,作者将之归因于“社会历史条件、顾炎武个人品质和治学理念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个话题别有新意,其探讨颇有意义。

## (三) 评传

评传类的大部头著作有3部:《顾炎武论考》(沈嘉荣,1994)、《旷世大儒——顾炎武》(陈祖武、朱彤窗,2000)、《顾炎武评传》(许苏民,2006)。

比较而言,《顾炎武论考》和《顾炎武评传》在研究思路上相似,都具有如孙雪霄博士评论二书时所说“人物传记与学术论著结合”<sup>[10]</sup>之特点,除了顾氏的时代、生平事迹与著作之外,还对顾氏的思想

做了较全面的论述——沈著论及哲学、伦理、政治、法律、经济、教育、史学、文学八个方面,许著除了未论及沈著所论的顾氏法律思想和教育思想,其余六个方面均有所论,而且还论述了顾氏的宗教思想。不过,此二书对顾炎武的历史定位有明显差异:

沈著《前言》说:“顾炎武是明末清初与王夫之、黄宗羲齐名的三位学术大师之一。他毕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与创新,呕心沥血,作出了杰出贡献。他的大量著述,是中国人民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sup>[12]</sup>;

许著《后记》则称“本书的写作,历时三年,自始至终受到萧箴父先生的亲切翔和精心指导。……先生明确指出:‘应该从中国社会转型与思想文化变迁的历史高度,把顾炎武定位为中国十七世纪伟大的早期启蒙思想家。’……先生关于顾炎武思想的历史定位的论说,成为本书一以贯之的基本指导思想。”<sup>[13]</sup>故其《内容提要》开宗明义第一句便是:“顾炎武是中国17世纪伟大的早期启蒙思想家。”<sup>[14]</sup>

因其如此,沈著是以“全面清理与探讨顾炎武的生平及其学术”<sup>[15]</sup>为研究宗旨,故而“详细追踪了传主艰险而传奇式的一生,考订其行事、交友,分类剖析了顾炎武广博的学术成就,包括哲学、伦理、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史学、地理、金石、音韵、诗歌、散文等等,全面地反映了顾炎武的人品和学问”<sup>[16]</sup>;许著却是以发掘蕴藏于顾氏著述中的启蒙思想为研究宗旨,故全书除起首二章论述顾氏生活的时代及其生平事迹,其余各章都是从不同方面论述顾氏思想,最后(第十章)总论顾氏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命运。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沈著中考辨了向有疑问的所谓“亭林著作”《惧谋录》四卷,但最后并未下定论,实际仍疑其为伪托之作,但此书却为《顾炎武全集》所收,不知其书编者据何论定它为“确定无疑”的顾氏著作。

《旷世大儒——顾炎武》最初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2010年更名《顾炎武评传》并除去原第二作者之名,重新付梓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其内容与前者大同小异。该评传以叙述顾氏生平事迹为主,最后几章(第11—14章)考证了顾氏致弟子潘耒的若干书札,并分别专门论述了顾氏的《广师篇》、《日知录》及礼学思想的历史地位。陈先生对顾炎武的总体看法与评价集中反映在其书2010年版《前言》中,有四个要点:其一,《日知录》、《音学五书》、《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等论著“宛若一座无比厚

重的丰碑,昭示了历史演进的轨迹,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其二,“顾炎武崇实致用的治学精神,严谨绵密的考证方法,以及他对广阔学术门径的开拓,影响一时学风甚巨,对整个清代学术文化的发展,亦显示了深远的历史作用”,尤其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在学术思潮从宋明理学向清代朴学的转化过程中,作为一个开风气者,顾炎武的历史地位是无可取代的”;其三,顾炎武一生将道德、学问、文章三者融为一体,“成为数千年儒林的楷模”;其四,顾炎武“操志高洁,人格傲岸”,所倡导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中华民族的巨大精神财富”。

#### (四)小传

小传(含故事)类成果有三十余种,作者有谢尧、马汉麟、吴晗、张岂之、段熙仲、黄淬伯、彭静中、朱仲玉、冉昭德、李永祥、张旭东、关学瑞、顾道馨、正石、路志霄、贾重纲、徐伯春、言藉、陈祖武、余方、戴文葆、李君明、王顺宝、吴长庚、陈其弟等二十多位,其中谢、马、吴、张、段、黄、顾、陈、戴诸先生都是著名的学术大家。在他们所作的顾氏小传中,较有代表性和颇具特色者有《爱国诗人顾炎武》(马汉麟,1951)、《清代的古音学创始人顾炎武》(王显,1957)、《爱国学者顾炎武》(吴晗,1962)、《明末清初进步思想家顾炎武》(张岂之,1962)、《清初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顾炎武》(余方,1987)、《清代经典考据学之祖——顾炎武》(吴长庚,2007)和列入《华夏英雄百人传》的《顾炎武传》(1983)、列入《中华民族杰出人物传》的《顾炎武传》(1984),以及徐伯春所著《江苏古代科学家》中的《顾炎武传》(1983)和戴文葆所著《历代编辑列传》中的《顾炎武列传》(1988—1989),这些小传从不同角度给予了传主以“爱国诗人”、“清代古音学创始人”、“爱国学者”、“进步思想家”、“教育家”、“清代考据学之祖”、“华夏英雄”、“中华杰出人物”、“古代科学家”、“古代编辑”等不同的身份定位与相应的历史评价。

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编辑家、出版家、作家戴文葆(1922—2008)先生在编写《历代编辑列传》时将顾炎武列入其中,他解释其理由道:“顾炎武是明末清初的爱国思想家和大学者,以撰著《日知录》等著闻于世。‘清初称学有根柢者,以炎武为最。’(《清史稿》本传)在不少领域内,他为身后三百年的学术研究指出了门径。这里将他作为编辑家看待,是因为他的学术工作常与编辑整理工作结合而展开,或直接表现为编辑整理工作。编辑工作成为他遨游于知识海洋的出发台,利用来深入追求的钻探机。他的有关治学论文、撰述编书的教言,为我国

古典编辑学增添了光辉。”<sup>[17]</sup>

更值得一提者,是著名史学家吴晗(1909—1969)先生所撰《爱国学者顾炎武》。这篇小传通过记述顾炎武饱经忧患、致力抗清、严谨治学的一生,除了赞扬顾炎武一丝不苟、虚心勤勉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主要是歌颂顾炎武崇高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认为“顾炎武首先是有气节、有骨气的坚强的爱国主义者,其次才是有伟大成就的学者”<sup>[18]</sup>。吴先生对顾炎武的这一历史定位,可以说是从梁启超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顾炎武所评“他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sup>[19]</sup>的一种历史性的发挥。吴先生作此小传时,正值顾炎武逝世280周年,但该小传又不仅仅是一种纪念之作,从其写作背景来看,当时中国正处在1960—1962三年困难期,同时早先的中苏友好合作关系破裂,苏联从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了其全部在华专家,当此国家危难之际,吴先生曾写下一系列论文,除《爱国学者顾炎武》以外,还有《文天祥的骨气》、《论民族英雄》、《谈骨气》等,这些文章都是有意识地宣传中华民族的一种优良品质,亦即毛泽东1948年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所说的那种品质——“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在当时,《爱国学者顾炎武》被刊发于《人民日报》,具有向全国人民进行“骨气教育”的现实意义。这篇小传在1982年经编辑删改后,和鲁迅的《范爱农》、孙犁的《山地回忆》、郁达夫的《书塾与学堂》一起被选入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秋季编辑出版的高中语文课本。嗣后,《语文教学通讯》发表了多篇论《爱国学者顾炎武》的教研论文,如《〈爱国学者顾炎武〉备课指要》(刘湛书,1983)、《抓两点,求直线——我〈教爱国学者顾炎武〉》(梁世楷,1985)等,其中梁世楷的文章在评论《爱国学者顾炎武》的写作手法时这样提到:作者在内容选择上,只择取了顾炎武的“爱国”方面的材料,其他概莫涉及。甚至作者为了突出“爱国”这一中心,将顾炎武“治学”之事,也分别按“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列入“其次才是有伟大成就的学者”的论述之中。

#### (五)考证

此类成果有近60篇。其中考证顾炎武交游活动者最多,有20余篇,作者有赵俪生、戈春源、暴鸿昌、来新夏、刘秋彬、林乐昌、常新、王星慧、郭晖、棠生、沈潜、张光兴、方良、张涛、周金标、周于飞、郭晖、韩梅等,其文章分别考察了顾炎武同张尔歧、钱谦益、昆山徐氏兄弟(乾学、秉义、元文)、申涵光、曲周路氏(路振飞及长子泽溥、次子泽淳、季子泽浓)、

“关中三友”(李因笃、王弘撰、李颀)、曹溶、屈大均、黄宗羲、徐夜、王猷定、朱鹤龄、傅山、黄旦、黄培、杨还吉、张允抡的交往。其中特别值得一提者,是韩梅所作《顾炎武在即墨的交游与创作》(2011)一文提供了一些新材料,证明了顾炎武在清顺治十四五年(1657—1658)间游历即墨时所结交的人物除了当地望族黄氏家族的黄坦、黄培和寓居即墨、曾任饶州知府的莱阳进士张允抡以外,还与即墨另一望族杨氏家族中的名士张还吉(1626—1700,字启旋,后更字六谦,号允庵)有诗书往来——作者从《山东文献集成》第二辑第42册《山东即墨杨氏诗集》中检索到张还吉《得顾宁人书》一诗并写录之,这是顾、张间曾有诗书论交的铁证材料,为顾氏生平研究中的一个新发现。此外,还有刘红娟所撰《归庄遗墨〈墨竹诗翰卷〉述考——兼论归庄、顾炎武、路安卿之交游》(2012)一文,提到了归庄赠送给友人路安卿的遗墨《墨竹诗翰卷》之卷后附有顾炎武的题识“寓人琴之思”,并指出该书画卷不仅诗、书、画三绝,还是归庄、顾炎武、路安卿三人易代之际在历史朝代的夹缝中惺惺相惜、患难与共、风雨同舟关系的写照。另外,周可真在《明清之际新仁学——顾炎武思想研究》(2006)中专门列目《广交清朝官员(上、下)》,详细考察了顾炎武与清朝官员的交往,其中涉及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近30位,包括施闰章、程先贞、颜光敏、孙承泽、陈上年、沈荃、李源、李涛、卫既齐、谭吉璫、谢重辉、韩葵、汤斌、汪琬、李天馥、叶氏兄弟(方恒、方嵩)、梁清标、张云翼、郭九芝、王孙蔚、熊儒,以及顾氏亲戚中在清朝做官的外甥徐氏三兄弟、外甥女婿申穉、侄子顾洪善。

上述考证性论著,除了少量文章——如张涛《顾张交往年代辨正二则》(2006)是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上考证顾炎武、张尔岐交往中的两个重要年代,证明(1)顾、张初识于康熙元年(1662)和(2)亭林《与友人论学书》“很可能”作于康熙七年(1668)初春,而张氏回信则在该年夏季之后以外,大多数论著不仅在于澄清顾氏交游事迹的真相,还在于用事实来印证和说明其他相关问题,例如:

暴鸿昌《顾炎武与徐乾学兄弟》(1998)通过对顾炎武与其外甥徐乾学、徐秉义、徐元文之间交往关系的考察,除了证明“在康熙时代,徐氏兄弟处在为朝廷笼络士类的显赫地位,收拾四海人才,却未能笼络住自己的母舅”,更是借助于该事实来说明“顾炎武孤忠磊磊、至老不渝的遗民立场及其伟大人格”,同时说明“顾炎武对徐氏兄弟怙势气焰痛疾

至深,徐氏家族在昆山的权势和劣行,是顾炎武长期北游,至死不回故乡的重要原因”;

王星慧《康熙二年顾炎武在山西与曹溶、李因笃的交游考——兼论顾亭林的交游思想》(2006)证明顾炎武在交游过程中“不仅和同他志同道合的遗民而且和贰臣都有交往”,据此得出“亭林的交游思想是复杂且开放的”的结论;

常新《明清之际关学与外界的学术互动——以李二曲与顾炎武的交往为例》(2006)则是要以学术上“宗朱子”的顾炎武和“本于阳明心学,又以朱学为补充”的李颀之间的交往事例来说明,“明清之际,社会发生急剧变化,士大夫对历史文化进行反思和总结,他们把关注的焦点放在理学,集中对曾经左右他们的文化进行批判,这一过程从地域上讲是各种学术流派进行交流、融合的过程。作为重要地域文化的关学在交流互动过程中,影响了一大批士人,推动了关学与其他地区的学术交流与发展”;

周金标《顾炎武与朱鹤龄交往考论》(2009)证明顾炎武和朱鹤龄“交往甚密”,不仅一起参加惊隐诗社,还至少有三次书信往复,他们“砥砺气节,切磋学术”,作者认为,正是通过这种交往,“炎武对朱氏的学术道路起了决定性影响”;

刘秋彬《曲周路氏与顾炎武交游论略》(2012)证明其“30余年”的交往中“路氏对顾炎武有举荐之情、援手之恩、通联之谊”,并说明他们之间这种“情谊深笃”的关系有别于那种“追名逐利、趋炎附势”的交往。

周于飞《“归奇顾怪”——归庄与顾炎武交游考》(2011)认为考察归庄和顾炎武之间的交游,将有利于研究清初遗民文学的创作,因为他们交往长达四十年,有“归奇顾怪”之称,又均是复社及惊隐诗社的成员。

此外,许苏民先生的《释“萧然物外,自得天机”——顾炎武何以认为自己不如傅青主》(2007)一文,从人生态度、学术取向、思维特征三个方面,诠释了顾炎武赞赏傅山的“萧然物外,自得天机”蕴含“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自由自觉的学术精神和智慧洞观的哲学思维方式三重意义,旨在说明傅山在这三方面都要高于顾炎武,并说明“顾炎武不愧为思想伟人,不愧为傅山的挚友和知己,他深知自己的思想学说不如傅山富于‘萧然物外,自得天机’的精神魅力,并且把他笔之于书,流传后世,这是何等伟大宽广的胸怀!这样的胸怀,恐怕是连孔子和朱熹也没有的。”<sup>[20]</sup>

其次,以顾炎武的游历为主题的考证性论文有

10 篇:《清初明遗民奔走活动事迹考略》(赵俪生, 1981)、《顾炎武北上抗清辨析》(黄正藩, 1986)、《顾炎武北上抗清说考辨》(王春瑜, 1989)、《顾炎武北游事迹发微》(赵刚, 1992)、《顾炎武北游不归之原因探析》(陈友乔, 2009)、《顾炎武北游不归的地域倾向性探析》(陈友乔、黄启文, 2008)、《顾炎武北游期间的经济生活》(陈友乔, 2009)、《论顾炎武读书、游历与治学之关系》(徐奉先, 2012)、《顾炎武旅游考论》(武少青, 2007)、《顾炎武政治旅行研究》(牛余宁, 2009)、《顾炎武山东经历考述》(王延栋, 2011)。其中, 赵俪生的文章通过对顾氏诗文之中诸如《秀州》“明年祖龙死”之类的有关隐语的分析来证明身为明遗民的顾炎武怀有反清倾向。黄正藩的文章更断定“顾炎武北上抗清”, 认为心存报国思想的顾炎武把抗清复明视为神圣的使命和终身奋斗的目标。王春瑜的文章持论则与他们相反, 指出:“顾炎武的北上远游, 实际上是避祸保身的消极行动, 而不是像某些史家所说那样, 旨在进一步积极策划抗清活动。”“一些说他在从事秘密策划抗清活动的史家们, 其主要论据, 不外这几点……这四条论据都难以成立。”“顾炎武在北方既然没有从事抗清活动, 那么, 他在北方的 25 年内, 究竟干了些什么呢? 我们认为, 根本一点, 是辛勤著述, 总结明亡教训。如果说, 顾炎武北游避祸是一种消极的政治行动的话, 从学术方面看, 其北游对他一生的学术成就, 则具有决定性的积极意义。”“为什么史学界许多同志在论及顾炎武 1657 年后的活动时, 都很牵强地把他说成是在北方积极从事抗清秘密活动, 甚至加以绘声绘影呢? 这是值得深思的。我们认为, 在很大程度上, 是由于某些同志不加分析地照搬前人的旧说, 没有廓清封建、资产阶级史家, 特别是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蒙加在顾炎武身上的一层历史云雾。”“史学的灵魂是实事求是。我们不当再不加分析地照搬前人的旧说, 从而继续曲解顾炎武 1657 年后在北方活动的真相”。<sup>[21]</sup>

陈友乔的文章则探析了顾炎武北游不归的原因, 认为主因有三: 一是北游前段, 他因为躲避来自里豪和家族内部的迫害不敢归; 二是在北游后段, 他因为经济上的窘迫而不能归; 三是超越前段不敢归和后段不能归的深层原因在于他基于遗民心理的不忍归。面对恢复希望渐趋渺茫的形势, 他强忍不归。陈友乔与黄启文合作的文章进一步认为, 顾炎武之所以走上北游的不归路, 其地域倾向性(即钟爱北方, 尤其是西北, 而对南方心存偏见)也是其

原因之一, 这种地域倾向性的形成主要有魏晋以降北方学术文化观的影响、顾氏特立独行的性格以及顾氏个人的人生经历三方面的原因。徐奉先的文章则探讨了顾炎武的北游经历对其学术研究所产生的影响, 认为这种影响具有“促进和限制的双重作用”。

武少青、牛余宁、王延栋的文章都是硕士学位论文。其中, 武文把顾炎武看作明清易代之际继承和发扬明代徐霞客等人的旅游传统的一位遗民旅游家, 认为他是“欲有所作为又不能出仕清廷”才“选择游历这条道路”, 其旅游对他来说不过是“以游为业”, 以实现其在乱世异代中的“为”。作者将顾氏一生游历分为五阶段——(1)早年的读书应试优游生活、(2)明亡前后的武力抗清、(3)卜居南京的联络义士以待再起、(4)中年北游山东和(5)晚年游学关中, 通过剖析其旅游行为, 认为顾氏所奉行的是一种实用主义旅游观, 它具有目的性、持续性、生产型和审美元素转换等特点。牛文也是以时间为线索, 将顾氏一生的旅行历经归纳为少年文人、青年抗清、中年北游、晚年著述经世“四级阶梯”, 认为他的旅行是在明清政权变革过程中, 站在一个明朝遗民的立场, 从儒家“夷夏之防”的角度来看待社会现实, 深感有“明道救世”的必要, 以“体国经野之心”和“济世安民之识”, 为“寻求经世致用的有补于国计民生的道理”和实现“自我理想、政治抱负”而开展进行的一场“政治旅游”, 是其“个人价值取向再分配的过程”, 并且具有“明遗民旅行的典范”意义。王文则以顾炎武的各类年谱和著述为中心, 综合各种史料, 比较详细地考察和分析了顾氏北上山东的原因、与山东重要友人的交游和交友原则及其变化、身陷山东官司的由来、经过及其影响以及在在山东的田产经营等, 据此认为“顾炎武的山东经历既是其迫于时代环境的无奈之举, 又是他追寻‘待后王’人生诉求的典型遗民式行为”。

再次, 考察顾炎武与其活动地域之间的关系及其在这些地域的行迹者有 12 篇:《顾炎武与北京》(容肇祖, 1963)、《顾炎武与五台山》(尹协理, 1986)、《顾炎武的北游与定居华下》(李广林, 1985)、《顾炎武在山西小议》(赵汝泳, 1989)、《顾炎武关中行迹考述》(卢兴轩, 1992)、《顾炎武陕西踪迹考》(魏光, 1994)、《顾炎武在关中》(赵俪生, 1999)、《尚冀异州贤 山川恣搜寻——顾炎武与泰山》(袁爱国, 2001)、《顾炎武山西行迹考》(常新, 2007)、《顾炎武与曲沃》(刘合心, 2008)、《顾炎武与语濂泾》(陈益, 2010)和《顾炎武的山西情结: 晚年

游历山西并作诗纪念》(马承钧,2012)。其中尹协理的文章考察了顾炎武与五台山的关系,认为顾炎武不但游历过五台胜境,而且对五台山与五台佛教史的研究曾做出过重要贡献,至今仍有参考价值——由此可见此类文章之概貌;卢兴轩的文章考察了顾炎武在关中游历的行迹,指出他在康熙年间四次入陕,前后居住时间达三年之久,陕北的榆林、延安有他的足迹,关中的华阴,临潼、周至、西安、乾县、富平、大荔、铜川有他留下的文章诗篇——由此亦可知此类文章之大概。

还有考察顾炎武与惊隐诗社和复社关系的文章2篇:《顾炎武与惊隐诗社》(谢国桢,1978)、《顾炎武与复社》(周可真,1992)。其中,谢先生的文章提供了比较丰富的相关史料,为研究惊隐诗社及顾炎武与惊隐诗社成员的交游必读之文;周可真的文章为赵俪生先生在《顾亭林新传》中所提出的顾炎武十七岁入复社之说进行了资料较为翔实的补充性考证,推翻了以往顾氏年谱及传记中顾炎武十四岁入复社的陈说。

此外,尚有近10篇杂考,包括《顾炎武的家世与早年生活》(赵俪生,1984)、《顾炎武杀奴案》(陈正贤,2012)、《顾炎武山东入狱考》(鲁海,1994)、《顾亭林“济南狱”与〈赴东诗〉考论》(王冀民,1992)、《三藩起义与顾炎武晚年》(陆明杰,1963)、《顾炎武、傅山与票号无关》(师育谦,1985)、《顾亭林旅卒曲沃小考》(赵俪生,1985)、《顾炎武佚文二则及其人事考》(张民权,2004)等。其中,赵俪生先生的文章首先评论说,顾炎武是一个具有开创性成就的大学者,还是一个终生不懈地关注着民族、国家和整个社会,跟社会的每一个脉搏都扣得紧紧的爱国者,更重要的是,这两点不是互相游离的,而是紧密地配合在一起。他从书本知识的积累出发,走向社会活动(包括明的活动和暗的活动),而社会活动的积累,又反过来,使他的学术成就不是琐碎的和僵死的。进而将顾氏人生经历划为三大段:第一段,32岁上半年以前的三十一年半时光,是在一个寻常绪绅地主家中度过;32岁上,清兵下江南,他有十二年半的时光,花费在对满清军事贵族残暴统

治下所进行的明的和暗的斗争之中;45岁,他离开江南到了北方,在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及其毗邻地区,进行了二十五年不懈的活动,包括学术上的调查研究,和为了某种目的而进行的社会、经济、军事、民族情况的调查研究,这些调查研究,对于某种目的的达成可能是助力不明显的,但其研究成果对客观存在的社会,对一代一代人活下去的社会,却无疑极为有益。此文是从顾炎武的家世和乡土环境方面来考察其生平经历中的第一段。

总体看来,大陆学术界对顾炎武生平的研究,以赵俪生、王春喻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常纠结于顾氏后半生的活动有否意欲或实际密谋抗清的问题,其中除王春喻等少数学者以外,绝大多数都持肯定态度,只是对顾氏“反清复明”的评价存有歧见<sup>①</sup>;新生代学者则几乎都不再纠缠于这类问题,特别是像武少青、牛余宁、王延栋等“80后”硕士这样的青年学者,他们更是比较集中的倾向于从旅游学角度来考察、审视和评价顾炎武的游历生活。

#### 四、对顾氏学术的整体研究

对顾氏学术的整体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初叶,1920年10月梁启超(1873—1929)先生著成《清代学术概论》<sup>②</sup>,其中关于顾炎武与清学“黎明运动”之关系一节,即是总论顾氏学术。1922年,柳诒徵(1880—1956)先生在《学衡》第5期发表《顾氏学述》一文,在反驳梁氏之论的同时,也表达了他对顾氏学术作为一个整体的独特看法。1923—1925年间,梁启超又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sup>③</sup>,其中第六节《清代经学之建设》首提顾氏《与友人论学书》实系“亭林学术大纲”,进一步表达了他对顾氏学术的总体看法,同时也回应了柳诒徵针对其《清代学术概论》所提“顾氏之精神,在行己有耻,梁启超谓顾氏‘以经学代理学,是推翻一偶像而别供一偶像’,实断章取义,不达本旨”<sup>[22]25</sup>的驳议,指出:“亭林所标‘行己行耻’、‘博学于文’两语,一是做人的方法,一是做学问的方法……亭林教人做学问,专标‘博学于文’一语……其目的在反对宋明学者以谈心说性为学。”<sup>[23]</sup>193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钱穆(1895—

① 沈嘉荣《顾炎武论考》(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7—370页有“争议的几个问题”的论述,叙及1963年由南京历史学会主办、在南京举行的纪念顾炎武诞生35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争论,其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评价历史人物问题”和“如何估价顾炎武的爱国思想问题”。

② 原题《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连载于1920年《改造》杂志,后改为现书名以单行本由上海商务印馆初版于1921年2月。

③ 原为作者在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讲授中国学术所编之讲义,其中《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四章曾以连载形式发表于1924年《东方杂志》,全书则在梁启超逝世后由上海民智书局初版于1929年,1932年由中华书局收入《饮冰室合集》出版,1936年中华书局又出版其单行本。

1990)先生所著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sup>①</sup>,其书第四章《顾亭林》所提“(亭林)学术大要”与梁氏所谓“亭林学术大纲”同义,谓“亭林论学宗旨,大要尽于两语,一曰行己有耻,一曰博学于文,其意备见于《与友人论学书》。”但又说:“盖亭林论学本悬二的,一曰明道,一曰救世。其为《日知录》又分三部,曰经学,治道,博闻。后儒乃打归一路,专守其经学即理学之议,以经术为明道。余力所汇,则又及博闻。至于研治道,讲救世,则时异世易,继响无人,而终于消沉焉。若论亭林本意,则显然以讲治道救世为主。故后之学亭林者,忘其行己之教,而师其博文之训,已为得半而失半。又于其所以为博文者,弃其研治道论救世,而专趋于讲经术,务博文,则半之中又其半焉。”<sup>[24]</sup>1937年《论学》第5期发表了李源澄(1909—1958)先生所撰的《亭林学术论》一文,这亦属顾氏学术之总论。新中国建立以后,张舜徽(1911—1992)先生著《顾亭林学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初版,中华书局1963年修订版),是书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创造性地对顾氏学术作了“全面而概括的说明”,可视为建国以来对顾氏学术作整体研究的开山之作,对后来的学者从整体上去把握和进一步研究顾氏学术起到了发凡起例的引领作用。

对顾氏学术的整体研究集中体现在对顾氏学术性质的探讨。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术界对顾氏学术性质的探讨,起初主要是围绕着对顾氏“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的命题的不同理解来展开的,其意义在于辩明顾氏学术的基本性质,即它到底是属于理学还是经学抑或其他?

如上文所提及,对此问题的探讨和争论是肇始于梁启超与柳诒徵二先生。梁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从全祖望(1705—1755)《亭林先生神道表》转引顾氏“经学即理学”一语,以为“此语有两病。其一,以经学代理学,是推翻一偶像而别供一偶像;其二,理学即哲学也,实应离经学而为一独立学科。”<sup>[25]</sup>按梁氏此论,他是论定顾氏学术属于“经学”而非“理学”。而柳先生在《顾氏学述》中指摘梁氏之论乃“断章取义,不达本旨”<sup>[22][25]</sup>,并指出:“顾氏之学,非后世之理学家,非后世之经学家,非后世之文学家。其生平之宗旨,惟在实行孔孟之言,以学问文章经纬斯世,拨乱反正,仅以某一家当之,陋矣!”<sup>[22][22]</sup>又说:“明于顾氏治经之宗程朱,则知顾氏‘经学即理学’一语,初非反对理学,惟反对不讲经

学之理学耳。易言之,即顾氏之学,欲以经学之理学,代不讲经学之理学,而绝非以经学代理学。”<sup>[22][25]</sup>

在柳先生看来,理学是宋儒之学的主体,其特点是讲求修身为人之道,特重躬行实践而不专事空谈,故他在论定顾氏学术为“经学之理学”的同时,强调了“顾氏之精神,在行己有耻”<sup>[22][25]</sup>,即认为顾氏学术是以讲求“行己有耻”为本质特征的“经学之理学”。张舜徽先生在《顾亭林学记》(1963年修订本)中,是将这个议题纳入“分论”部分“理学”条中来讨论的,其持论与柳诒徵相似,认为“他(亭林)所谓的‘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只是说明古人所谓理学,是从经学里面提炼出来的。非长期钻研经学,自然够不上谈理学。顾氏意思,是想拿讲求经学的理学,代替不讲经学的理学。而绝不是直截用经学代替理学。语意十分明显。后来全祖望所作‘亭林先生神道表’,称引这句话,直作‘经学即理学’;和顾氏原意,大有距离。……近人梁启超所写《清代学术概论》,根据全祖望所提‘经学即理学’的话,曲解为‘以经学代理学’,其说更谬,必须辩明。”<sup>[26][64]</sup>但张先生认同梁启超、钱穆视顾氏《与友人论学书》所标“行己行耻”“博学于文”为其学术指要的观点,并吸取钱穆关于顾氏学术“以讲治道救世为主”的论点,将“顾氏学术趋向”归纳为“经世致用”和“经史考证”两个方面,并指出这“只是一件事的两面,也必然是彼此联系,互相依倚的。就顾氏当日治学的全体来说,经史考证,他自己认为只是一种做学问的手段与方法;经世致用,才是他做学问的归宿与作用。没有经史考证的功夫来谈经世致用,便易流于空疏;没有经世致用的宏愿,来谈经史考证,便易流于琐碎。”<sup>[26][11-12]</sup>张先生对顾氏学术的总体看法,不是从其学科归属上将它归入经学或理学,而是从其学术宗旨和学术功用角度把它理解为“经世致用之学”。

《晋阳学刊》1985年第5期发表了姜广辉所撰之文《顾炎武与清初学风的转变》,此文对张舜徽先生关于“顾氏学术趋向”包括“经世致用”和“经史考证”两个方面的观点作了新诠释。姜先生指出,清初学术趋向大致有三端:旧有的理学以及新起与理学相对立的事功之学和考据之学。事功之学与考据之学是有矛盾的,但在批判理学的活动中它们却在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思想家们为解决“当世之务”,常常要到古代经、子中寻找救弊之方,因而考据方法就成为征古通今的桥梁。顾炎武是当时

① 此书原系作者在1931—1936年间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学术史的讲义。

这种学术路径的代表人物之一。

姜先生上述论文发表后的第二年,张显清先生在《中国哲学史研究》1986年第2期撰文提出了“实学”和“实学思潮”的概念:“在晚明形成了一股提倡‘实学’的思潮……这股思潮,继承发展了中国思想史上体用兼尽、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抨击心性空谈,倡导实学、实才、实行、实事、实用、实效、实功,以期达到富国、足民、强兵之目的。”“阳明心学的没落宣告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理学阶段的结束,续之而起的是以实学为时代精神主流的阶段。这个阶段自明代中叶一直延续到清代中叶”<sup>[27]</sup>。此后不久,更有学者组织编写了《明清实学思潮史》,参与该书编纂工作的陈祖武先生负责撰写了顾氏学术部分,其论定顾炎武为“清初务实学风的倡导者”,认为顾氏学术在明清之际起到了“转变明季空疏学风,开启清初实学先路”的历史作用,并将顾氏实学的基本内涵概括为“崇实致用”、“博学于文”、“行己有耻”。<sup>[28]</sup>

从张舜徽到姜广辉再到陈祖武,其于顾氏学术之根本性质的看法,基本上不出乎“经世”之论。

萧蓬父(1924—2008)先生与许苏民合著的《明清启蒙学术流变》(1995)一书则把明代嘉靖初到清道光二十年(16世纪3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这三百年的中国学术称为“明清启蒙学术”,认为这种早期启蒙学术是以“个性解放思想”、“初步民主思想”和“近代科学精神”为历史课题<sup>[29]784</sup>,按明清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特点,可分三个阶段:从明代嘉靖至崇祯为第一阶段,其主要特点是“抗议权威,冲破囚缚,立论尖新而不够成熟”,颇具“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人的重新发现’与‘世界的重新发现’的特征”;从南明弘光、永历到清康熙、雍正为第二阶段,其主要特点是“深沉反思,推陈出新,致思周全而衡虑较多”;从清乾隆到道光二十年为第三阶段,其主要特点是“执著追求,潜心开拓,身处洄流而心游未来”。<sup>[29]2-20</sup>根据这个总体学术史观念,他们把顾炎武的学术纳入“明清启蒙学术”范畴,认为顾氏学术属于明清启蒙学术的第二阶段,是该阶段之“经学及其考据之学”的代表<sup>[29]4</sup>。该书论及顾氏学术三方面的内容:(1)以“各得自私自为”的“众治”论为内容的政治哲学;(2)以反对“禁防束缚”,倡导豪杰精神为内容的个性解放学说;(3)以“明道救世”的经学研究及其方法论为内容的知性精神。其如此来论定顾氏学术乃至整个这三百年中国学术之根本性质,乃是“着眼于中国开始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化的文化进程,确立主潮,观其流变,正面论述,

彻底跳出所谓‘两军对战’、‘汉宋纷争’、‘朱陆异同’之类的陈旧模式”<sup>[29]783</sup>。

葛荣晋先生与魏长宝合著的《一代儒宗顾亭林》(台湾文津出版社,2000)一书则又重新回到“经学即理学”的论题上来探讨顾氏学术的性质,提出了“经学即理学”是“亭林的学术纲领及其中心学术理念”<sup>[30]88</sup>的观点,他们把该命题的含义理解为“以经学为本”和“以理学为宗”两个方面,并认为“以经学为本,是针对宋学游谈无根的学风而发的,强调的是‘博学于文’、‘多学而识’的理念;以理学为宗,是针对宋学空疏无用的学风而发的,强调的是‘行己有耻’、‘经世济民’的理念。”<sup>[30]88-89</sup>实质上就是把顾氏学术本质地理解为一种以讲求“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本质特征的新理学,这近似柳诒徵先生的观点,或可视为对后者的一种继承和发挥,但更富含新意——他们指出,以往学者将顾氏学术归结为“考证之学”或“经世之学”或“理学余波”,这“都比较准确地描述了亭林学术的特点……且都各有其道理,这其实正好说明了顾氏学术的包容性和创造性,即亭林学术的真正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上述诸方面中的任何一个侧面,而在于他把这几个方面都结合起来,包容进自己的理论中,并进行了创造性的转换,从而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学术理念,这就是他所一再强调的‘经学即理学’的学术纲领。……考证之学、经世之学和理学本来是宋明学术中即已发展起来的三个不同的学术方向,但在宋明时期,这三个方面基本上是各自独立发展的。……亭林打出‘经学即理学’的大旗,把宋明学术中潜伏发展的经史考证学风和经世致用学风发扬光大,并以之作为理学的基础和宗旨,宋明以来各自独立发展的经史考证理念、经世致用理念和理气心性之辨的理念便被结合起来,形成了一条全新的学术纲领。在这个新的纲领中,考证之学和经世之学从两股细流变成了滔滔巨川,成为新时代的主流学术话语,而理学话语则在新的学术语境中得到了重新理解和阐发,并从中心退居边缘。……亭林之所以被称为清学开山而特别为群流所共仰,就是因为他提出了新的学术纲领,创立了新的学术理念,从而改变了一个时代的学术方向。并且,他还发展了一套完善的治学方法,撰著了一批具有典范意义的研究著作,因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学术风气,成为后人效法的典范和新的学术潮流的领航人。”<sup>[30]92-96</sup>他们还首次明确提出了“亭林的学术范式”,同时指出了“亭林的学术范式就体现在他的学术方法和学术风格中”<sup>[30]96</sup>,并分别从“重纂辑”、“明流变”、“善归



纳”、“求证佐”、“躬实察”五个方面阐释了顾氏的学术方法和“治学精神”、“学术品格”、“学术旨趣”三个方面阐释了顾氏的学术风格,其中较有新意者是以“崇实学、尚博通”来概括顾氏的学术旨趣,尤其将“崇实学”析义为“崇实证”与“崇实用”两个方面<sup>[30]109</sup>,确系精辟之论。

周可真的观点与上述都不同,他认为“顾炎武思想按其本质内容来说,就是关于‘明道救世’的思想”,而“就顾炎武思想的根本性质而言,就其作为一种伦理思想而言,它实属于‘仁’范畴,是一种‘仁’的思想,即他对传统儒家‘仁’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顾炎武所谓‘明道救世’,其所‘明’之‘道’即为他所创造性地加以阐发并竭力予以宣扬的作为宗法伦理之‘义’的‘仁’,其所‘救’之‘世’即为他所深切忧患的作为宗法伦理之‘理’的‘礼’遭遇厄运之世。他之所以孜孜从事于‘明道救世’之业,不过是为了挽救当时遭受到了严重践踏而处在深刻危机之中的宗法伦理(‘仁’与‘礼’)以图其复兴罢了。”<sup>[31]23-24</sup>因此,他把顾炎武思想概括为“明清之际新仁学”,认为顾炎武思想本质上是以“仁”为核心的反映中国古代社会宗法之“礼”在资本主义萌芽条件下损益新要求的伦理思想,其启蒙思想是与当时市民价值观相适应的有条件地承认“私”的伦理合法性的新仁道观,其爱国思想是顺应市民阶层本性要求而人道主义地化“忠”为“耻”的新忠君观,其实学思想是要求学者尊“耻”德而道问学的新学术观——这三方面的思想是顾氏伦理思想的不同表现形态。<sup>[31]24</sup>这也是对顾氏学术根本性质的一种论定。

综上所述,建国以来围绕顾氏学术性质问题所形成的不同看法,可以被概括为“经世说”、“启蒙说”、“新理学说”和“新仁学说”四种基本观点,而自清代流传下来的“考据说”虽然事实上仍有一定余响,但终究未见有公然替这种陈说作辩护的论著。

## 五、海外的相关研究

笔者居国内,网络又受限制,只能通过如朱政惠(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所写的《海外学者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及其思考》(《史林》2006年第4期)这类文章以及其它一些途径来间接了解有关顾炎武研究在海外的零星情况。

上述朱政惠先生的文章中提到,约翰·麦思基尔(John Meskill,或译“约翰·梅斯基尔”,美国巴德学院学者)在20世纪60年代主编了《中国历史的模式:循环、发展、停滞》一书,作者认为,为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的模式,不妨看看古代和近现代、东方和西方学者对此问题的见解,故该书作为一部文集所收的文章很广,有司马迁、刘知几、马端临、郑樵、顾炎武的,也有黑格尔、斯宾格勒、汤因比以及魏特夫的等。在顾炎武生平研究方面,美国史学家毕德生(Willard J. Peterson)曾著有《顾炎武的生活》(1968)一书,将顾炎武作为中国古代的一位史学名家予以推介。

日本学术界对顾炎武也有所关注和研究。上世纪80年代初,藤井良雄发表了《顾炎武诗中的孤高形象》(日本中国学会论文第32集,1980)一文。本世纪以来,大西克己发表了《顾炎武的政治思想》(《文化》66-1、2,2002)一文,其研究结论为“顾炎武的封建论,其意图是使地方士绅阶层的优越性直接与国家体制的强化挂钩。”<sup>[32]</sup>在顾炎武著述研究方面,著名中国史学家森正夫<sup>①</sup>撰有《顾炎武官田论中的土地所有思想及其背景》一文,载于东京汲古书院2006年出版的《森正夫明清史论集》(全三卷)。

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对顾炎武研究相当重视,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学术成果约有20余篇,包括《顾亭林学案》(中央文物供应社,《清儒学案丛书》,1954年)、《顾炎武论诗文》(一愚,《中央日报》1956年7月22日)、《顾炎武之学术思想》(林尹,《师大学报》1956年6月第1期)、《顾炎武与清初经世学风》(黄秀政,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顾炎武为何五入陕西?》(《历史月刊》72期,1994年元月)、《怪杰顾炎武》(黎明,《中央日报》1958年4月23日)、《顾炎武治学》(太玄,《中央日报》1959年4月20日)、《〈日知录〉杨令公祠正误》(余国栋,《大陆杂志》第21卷第3期,1960年8月)、《顾亭林的生平与学术思想》(黄逸民,《畅游》第22卷第2期,1960年9月)、《顾亭林教育思想之研究》(秦汝炎,《台湾师大教育研究所集刊》1961年12月第4期)、《顾亭林之教育思想(上、中、下)》(秦汝炎,《幼师学志》第3卷第1-3期,1964年1、4、12月)、《顾炎武的教育思想》(郑世兴,《台湾教育辅导

<sup>①</sup> 森正夫教授,1935年出生于京都市,1962年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67年在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修完博士课程后,专攻东洋史学,后来获得了日本国文学博士学位。曾任日本爱知县立大学校长。2013年8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著名明史专家周绍泉主译的森正夫、野口铁郎等所著《明清时代史的基本问题》。

月刊》第14卷第7期,1964年7月)、《〈日知录〉札记》(何佑森,《台大文史哲学报》第15期,1966年8月)、《顾亭林之生平及其思想》(胡秋原,《中华杂志》第5卷第7期,1967年7月)、《顾亭林的经学》(何佑森,《台大文史哲学报》1967年第16期)、《顾亭林的社会风气变迁论》(张承汉,《社会学刊》1968年第4期)、《顾炎武与清初臣——程先贞、史可程交游考》(谢正光,《故宫学术季刊》台北,1998年3月)、《清初的遗民与贰臣——顾炎武、孙承泽、朱彝尊交游考》(谢正光,《汉学研究》,台北,1999年12月)、《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历史知识的态度——以顾炎武为中心》(古伟瀛,《国际历史教育研讨会论文集》1985年8月)、《顾炎武政治思想之回顾》(古伟瀛,《史学评论》第9期,1985年1月)、《顾炎武经世思想的特色》(古伟瀛,《台大历史学报》第14期,1988年7月)、《明末清初遗民诗研究》(宋景爱,国立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论文,90学年度)、《告别理学:顾炎武对朱学的批判》(赵刚,台湾《清华学报》新第25卷第1期,1995年3月)和《顾炎武对〈春秋〉及〈左传〉的诠释》(古伟瀛,《台大历史学报》第28期,2001年第12月)。

上述台湾学者的论著中,与本文主题直接相关者仅有黄逸民的《顾亭林的生平与学术思想》、胡秋原的《顾亭林之生平及其思想》以及谢正光关于顾炎武交游的几篇论文。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海外著名明清史专家、美国 Grinnell 学院历史系教授谢正光先生,其学术活动跨越国界和地界,经常来往穿梭于太平洋东西两岸和海峡两岸之间,并有较多时间在台湾一些高校讲学,其论著也有许多是发表在当地一些大学刊物上,另外也有付梓于大陆出版社者,如《清初诗文与士人交游考》(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谢先生对顾炎武的交游深有研究,曾制作《顾亭林交游表》,以顾炎武为线索,涉及傅山等多位明遗民同清初降臣大吏的交谊。他在相关论文中,特意选取了顾炎武同清初贰臣(孙承泽、朱彝尊)、清初大吏(曹溶)及清初降臣(程先贞、史可程)的交游事例,据此来论证和说明“政统”与“学统”之间有区别。他还撰有《就〈秋柳〉诗之唱和考论顾炎武与王士禛之交谊》(1999)一文,考证了顾炎武与王士禛顺治末年在济南的论交,指出两人虽年辈悬隔,出处异抱,但未尝以政治分歧影响彼此情谊,他认为这是研究清初社会史应注意的一个现象。

至于香港地区的顾炎武研究,其成果仅检索到5篇——《顾亭林的文学理论》(黄肖玉:《华国》1958

年9月第2期)、饶宗颐《顾亭林诗论》(《文学世界》1961年第6期)、《论顾亭林学术与儒家之真精神》(牟润孙讲、李金钟记,《新亚生活》第4卷第11期,1961年12月)、《亭林诗文用南明唐王隆武纪年考》(潘重规,《新亚书院学术年刊》第8期,1966年9月)、《潘耒的史学——兼论顾炎武史学的继承》(曹光明,香港大学学术库,1985年),其中曹光明的20余万字的论文主要内容是论述潘耒的史学。这5篇论文中,与本文主题直接相关者一篇也没有。

仅从上述零星的信息也可以看出,海外的顾炎武研究极少涉及本文主题范围,对该主题的研究,中国大陆学术界是占有绝对优势的,应该说,这也是很自然的,合情合理的。

## [参 考 文 献]

- [1] 何焯. 菰中随笔序[J]. 转引自《顾亭林诗文集》,华忱之校点. 北京:中华书局,1983,(2):174.
- [2] 姚鼐元. 清代焚毁书目. 禁书总目. 军机处奏准抽毁书目.“亭林遗书”条,《续修四库全书. 九二一. 史部,目录类》[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37.
- [3] 黄坤.《天下郡国利病书》流传考[N]. 古籍新书报,2012年3月号,第271期.
- [4] 南京图书馆发现顾炎武、薛福成手稿[N]. 光明日报,1956年7月26日. 按:顾炎武手稿即《天下郡国利病书》手稿,薛福成手稿即《薛福成日记》手稿.
- [5] 钟敬文等. 书话文丛. 灯下书影:(上)上“谢兴尧”条[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 [6] 《顾炎武〈肇域志〉手钞本徐森玉先生献给国家收藏》[N]. 文汇报,1959—8—23.
- [7] 蒋维崧. 历史地理领域的奇书顾炎武生前未定书稿——《肇域志》点校整理本出版[J]. 全国新书目,2004,(8).
- [8] 辛德勇. 亭林文集[J]. 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3).
- [9] 朱士嘉. 中国历代名人年谱目录序[M]//中国历代名人年谱目录. 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 [10] 孙雪霄. 二十世纪顾炎武诗文研究评述[J]. 山东社会科学,2010,(5).
- [11] 赵儒生. 顾亭林与王山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3.
- [12] 沈嘉荣. 顾炎武论考. 前言[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1.
- [13] 许苏民. 顾炎武评传. 后记[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14] 许苏民. 顾炎武评传. 内容提要[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15] 沈嘉荣. 顾炎武论考. 前言[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2.

- [16] 沈嘉荣. 顾炎武论考. 戴逸序言[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4: 2.
- [17] 戴文葆. 历代编辑列传: 三十二 顾炎武(上)[J]. 出版工作, 1988, (12).
- [18] 吴晗. 爱国学者顾炎武[N]. 人民日报, 1962-2-7.
- [19] 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 北京: 中国书店出版社, 1985: 55.
- [20] 许苏民. 释“萧然物外, 自得天机”——顾炎武何以认为自己不如傅青主[J]. 文物世界, 2007, (6).
- [21] 王春喻. 顾炎武北上抗清说考辨[J]. 中国史研究, 1989, (4).
- [22] 柳诒徵. 顾氏学术[M]// 柳曾符, 柳定生选编. 柳诒徵史学论文续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25. 按: 其中引梁氏之语标点有误, 现据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清代学术概论》正之.
- [23] 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 北京: 中国书店出版社, 1985 年据 1936 年中华书局版影印版, 第 55 页、第 58—59 页. 按: 其中“亭林所标‘行己行耻博学于文’两语”标点有失, 兹重加标点.
- [24] 钱穆.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122, 145.
- [25] 梁启超撰, 朱维铮导读. 清代学术概论[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10.
- [26] 张舜徽. 顾亭林学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64.
- [27] 张显清. 明代社会思想和学风的演变[J]. 中国哲学史研究, 1986, (2).
- [28] 陈祖武. 清初务实学风的倡导者顾炎武[M]// 陈鼓应, 辛冠洁, 葛荣晋主编. 明清实学思潮史: 中卷. 济南: 齐鲁书社, 1989.
- [29] 萧笈父, 许苏民. 明清启蒙学术流变[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5.
- [30] 葛荣晋, 魏长宝. 一代儒宗顾亭林[M]. 台北: 台湾文津出版社, 2000.
- [31] 周可真. 明清之际新仁学——顾炎武思想研究[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6.
- [32] 中岛乐章. 张玉林译. 2002 年日本史学界关于明清史的研究[J]// 中国史研究动态, 2004, (12).

(责任编辑: 闫卫平)

## Literature Review on Gu Yan-wu's Academic Writing form 1950 to 2013

ZHOU Ke-zhen

(School of Society,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01512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reviews the progress on the study of Gu's posthumous works of literature,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his life and Gu's overall academic study by Chinese mainland scholars from 1950-2013. With respect to the overseas study on Gu Yan-wu, it only made a brief introduction.

**Key words:** Gu Yan-wu; Writing; Life; Academic Study; Literature Review

